



铭记海上抗战历史的光辉一页

——大鱼山战斗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军史文物



在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西北的东海海域，有一个形如遨游在海中的大鲨鱼的岛屿，这就是大鱼山岛。抗日战争时期威震东海的大鱼山血战就发生在这里，它是新四军唯一一次海岛战斗，也是人民军队进行的第一次海岛作战，在军史上留下了独特而又光辉的一页。

在当年烈士血染的地方矗立着大鱼山战斗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如下：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新四军浙东纵队命令海防大队第一中队向大鱼山岛进发，在舟山开辟海上隐蔽的游击革命根据地。因敌特告密于八月二十五日，敌人拼凑一百多个日军和四百余个伪军，调遣五艘木壳机轮，二艘登陆艇和“105”号大型战舰和两架飞机，在猛烈火力的掩护下包围大鱼山岛，坚守在大鱼山岛的六十四名指战员，英勇顽强地与日、伪军浴血奋战七小时，终因寡不敌众，除一部分同志突围外，三十七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长期以来，大鱼山战斗革命烈士纪念碑在当地发挥着继承革命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作用。

(一)

自从那场血战发生后，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岛上的居民都会把这一天作为岛上的忌日，自发来到烈士血染的地方，用当地渔民特有的方式祭奠在这里壮烈殉国的新四军战士。20世纪50年代，他们又将散葬于各处的烈士遗骨集中迁葬到当年的主战场——大岙岗，并在山顶立了一块花岗岩石碑。

1988年，中共岱山县委、县政府为更好发挥遗址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拨专款在大岙岗山腰上修建了这座大鱼山战斗革命烈士纪念碑。碑身呈塔形结构，用白色大理石砌成，高7.75米，占地196平方米，正面镌刻着“革命烈士纪念碑”几个金色大字；碑座正面是“大鱼山战斗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铭文，碑座两侧分别刻着纪念碑碑文和37位烈士的英名，尚有5位无名烈士没能刻上。

(二)

重读碑文，不禁让人回到战争岁月。1944年，为配合盟军的太平洋反攻，浙东新四军游击纵队派遣海防大队第一中队，深入位居东海要冲的大鱼山岛，开辟海上隐蔽的抗日根据地，作为海上反攻的跳板。8月21日，第一中队的64名指战员夜渡上岛以后，就积极宣传政策，发动群众，争取驻守在岛上的伪军。但他们的行动还是被汉奸跑去告了密。8月25日正是农历的七月初七，日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团团包围了大鱼山岛，一场血战就此展开。

这是一次兵力武器相差悬殊的战斗。我军64人，仅有机枪3挺、土炮2门、长短枪50多支，每人配备手榴弹4颗、子弹100发；而日军投入海陆空五六百人，出动舰艇10多艘、飞机2架，各种大口徑火炮、机关枪数十门，敌人总兵力近十倍于我，火力数十倍于我，这次战斗注定是一场恶仗。但身陷险境的新四军指战员临危不惧，迅速抢占了岛上的3个制高点，与由飞机大炮武装的敌人连续激战7个小时，击退了敌人4次疯狂进攻。

这是一次彰显气节气壮山河的战斗。大鱼山岛孤悬海上，一时间外无救兵，后无退路。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一天滴水未进的新四军战士顽强还击。子弹打完了用手榴弹，手榴弹用完了用石头砸，石头用完了就跟着敌人展开肉搏战，抱着敌人跳下山崖滚入大海。指导员严洪珠身负重伤，仍然伏地爬行整个阵地鼓舞士气。他16岁就参加革命，壮烈殉难时年仅22岁。当日伪军占领山岗，企图活捉伤员时，一名战士怀揣两颗手榴弹跃身冲向敌群，边跑边拉动引线，炸死多名敌兵，自己也当场牺牲。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大鱼山岛，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民族的尊严，表现了中国人民誓死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精神。

当年驻守舟山群岛的日军头目评价说“这是日军在中国海岛作战中所遇到的一次最顽强的硬仗”。敌我伤亡之比为2:1，日军死伤50多人，伪军死伤30多人。但最后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一部分同志突围外，42位壮士洒血大鱼山岛，他们的英灵永远屹立在这片山岗上，守卫着海岛。

当时人们就说：“北有狼牙山，南有大鱼山”，这次战斗被誉为“海上狼牙山之战”。事后新华社发了战报，新华社电台向全世界广播了这场重创寇敌的海上战斗，《解放日报》作了全文转载，《浙东战报》社为此专门出版了《血战大鱼山》连环画，还有人专门谱写了纪念这次战斗的《海防大队之歌》——“呼呼怒吼的风啊！白浪滔滔的海啊！漂泊在海上的船啊！都有我们同志在啊……”此战规模虽小，较少见诸史册，但其悲壮激烈却是14年抗战的一个缩影。

(三)

大鱼山战斗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虽

然不到200个字，但它简洁有力，主题鲜明，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

一是详尽叙述了事件的全部经过。纪念碑文按照内容划分，可分为纪事体碑文和纪事体碑文两种。大鱼山战斗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属于纪事体碑文，不但说明了当年那场血战发生的时间、地点、涉及的部队、人物，而且交代了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经过，使后人那场战斗了解得清楚明白，情景历历在目。

二是抒发了对革命烈士深切的怀念和敬仰之情。碑文开头点明了当时革命形势的严峻和环境的恶劣，又彰显了新四军战士不畏艰险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接下来对敌人兵力装备的详细记录，反衬了新四军战士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的英勇顽强，瞻仰者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碑文最后交待悲壮的结局，又使人一下陷入深痛的追思和怀念之中。

三是激励后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新中国成立已经70多年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正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要坚定不移地沿着革命先辈们开辟的道路走下去，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葛传根)



党史上的第一部反腐法令

在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陈列着一份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的特殊文件——《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它是中国共产党颁布的第一部反腐法令，见证了我们的党刀刀向内的坚定决心和依法反腐的伟大开端。

打响中央苏区反腐倡廉第一枪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不久，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党和苏维埃政府各级工作人员贪污、浪费、腐败等现象也逐渐表现出来，不仅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影响苏区经济的发展，还严重损害党和苏维埃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为此，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各种腐败行为予以批判和打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初，设立了中央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代表工农群众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检查和监督，负责对苏维埃工作人员贪污浪费等犯罪行为提起公诉。该部下设控告局，接受工农群众对苏维埃机关和工作人员的控告事件，号召群众检举揭发，把贪污分子驱逐出苏维埃。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还专设“突击队”“铁棍”“铁锤”“铁帚”“可耻的黑板”等专栏，专门刊登揭露苏维埃的各种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现象。从第56期起还专门开辟“检举运动专号”，以推动反贪污浪费运动。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及苏区军民的支持下，反腐倡廉运动在中央苏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并查处了一些贪污浪费案件。

1932年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干部谢步升因贪污、偷窃等罪被查处，由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设在叶坪村，因此谢步升有些熟络关系。这种情况给案件审理带来一定阻力。对此，毛泽东力主严惩，并指示说：“腐败不消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败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这样一来，案件调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最终，谢步



《红色中华》报刊登的反对贪污浪费、厉行节约的报道

升被依法判处死刑，打响了中央苏区反腐倡廉的第一枪，充分展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肃贪的决心。

出台党的第一部反腐法令

随着反腐运动的深入开展，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逐渐发现，由于缺少针对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专门法令，使得此类案件的审判与量刑没有具体的量刑规定与依据，亟需出台一部专门针对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法令。

毛泽东亲自谋划、身体力行，推进党的第一部反腐法令正式颁布。毛泽东多次在公开场合指出：“共产党的旗帜就是要打倒一切贪官污吏！”“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并通过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苏维埃大学及各种训练班等形式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保持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党性修养和优良作风，有效地提高了广大干部抗腐拒变的能力。此外，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还率先垂范，在吃、住等方面，不享受特殊待遇，与普通干部同甘共苦，为苏区的反腐倡廉树立了榜样。

毛泽东与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等一起多次征询司法机关领导人、工作人员

及工农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对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标准进行了细致地调查论证，特别是在死刑的量刑上，毛泽东等人也是极为谨慎。既参考了苏联的相关法令法规，又结合苏区的实际情况。训令对犯有贪污及浪费行为的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制定了明确的惩治标准。作为党的第一部关于反对贪污浪费的法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对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的贪污浪费行为作出了具体的惩治办法与量刑标准，党的反腐败斗争从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树立了清正廉洁 勤政为民的清风正气

为促进这一法令在中央苏区顺利开展，保证其权威性，《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以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的名义公开发布。同时，为了让更多群众了解这一法令，毛泽东还充分利用《红色中华》报这一苏区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报纸的宣传作用，将其刊登在1934年1月4日的《红色中华》报上。毛泽东号召群众揭发腐败分子的错误，要发现一个，严惩一个，决不姑息。

此后，苏区各级司法机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充分依据《关于惩治贪污浪费

行为》，查处、审判了许多贪污腐败案件。如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侵吞公款、公债、谷票、公物等合计大洋2000余元；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云贪污公款、携款叛逃、盗窃军事机密；于都县军事部部长刘仕祥等人贪污公款、利用职权经商牟利等先后都被最高法院判处死刑。

1933年10月，为迎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二苏大会”）的召开，中央政府决定兴建中央政府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馆等“六大建筑”，并将建筑施工任务交给中央政府总务厅负责。总务厅专门成立了“二苏大会”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云却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私开路条，并携款潜逃，最终叛变投敌。中央工农检查部根据群众举报，组织力量迅速查处了这一要案，查清了左祥云的犯罪事实。

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常务会议，讨论了左祥云及总务厅腐败案件。1934年1月4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公布案件相关人员的决定。然而此时却有人出来说情。对此，毛泽东强调一定要严格按照《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的规定进行判决，要求将此案件作为全苏区的警示教育材料，在《红色中华》报上发布；举行审判大会，对案件进行公开审理，让苏区的干部群众都来看一看、听一听。1934年2月13日，案件公审大会在中央政府大礼堂举行，临时最高法院依据《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的规定，判处左祥云枪决，另有一人分别被判处6年监禁和劳苦工1年。

据统计，截至1934年春，中央苏区共查处200余起贪污腐败案件，有力打击了贪污腐败分子，向全苏区党政干部敲响了反腐警钟，树立了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清风正气，有力地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钟军 苏春生)

中华英烈

王一飞：不为时代之落伍者

走进浙江上虞丰惠镇小庙弄6号，抬眼就能看到一幢典型的明清庭院式建筑，俗称“王家台门”，坐南朝北，青砖墙，石库门，这里就是英烈王一飞的故居。

王一飞，1898年11月17日出生。1910年，考入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1919年，受五四运动影响，他前往上海探索革命真理，开始了革命的历程。

1921年，王一飞被派往苏俄，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莫支部负责人。1924年6月，王一飞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少共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同年7月，他以中共列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因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1925年初夏，王一飞根据党的指示回到祖国，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不久又被任命为上海区委书记，负责上海和浙江两地的党务工作。在上海工作期间，王一飞与陆绶雯结婚。他常对妻子说：“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在动的状态中，如庸夫庸妇之终老庸下，寸步不出雷池者，不能，亦不愿！”

北伐战争期间，当北伐军进入江西战场与军阀孙传芳部激战时，王一飞受党中央委派，以中共军事特派员的身份赴江西前线视察，加强与北伐军苏联总顾问加仑将军的联络，多次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反映江西战场敌我力量对比状况，就北伐军继续进攻的方针和部署，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唐强)



刘邓大军自制的棉衣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览厅里，静静地摆放着一件文物——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自制的棉衣。经过七十多年的沧桑洗礼，这件粗布棉衣有些褪色发黄，但它却是革命前辈在大别山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宝贵见证。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序幕。坚持战斗两个多月后，初冬的大别山区阴雨连绵、寒风袭人。到了夜里，身着单衣的战士们在野外冻得背脊背、身挨身，蜷缩成一团，难以入睡，寻找冬衣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然而，由于部队立足未稳，且远离后方，物资匮乏，短时间内凑齐10万多套棉衣几乎不可能。从后方筹措这么大量的物资送往大别山，沿途要经过敌占区，难度和危险也可想而知。党中央和毛主席电令刘邓大军自行筹备缝制过冬的棉衣并坚持到12月或1月，或能等到后方接济。随即，刘伯承司令员指示各部队，就地购买材料，自行缝制棉衣。

于是，各部队根据政策和群众纪律，派出工作组向商家和群众购买、筹措布匹和棉花。与此同时，部队在作战中也缴获了一些布匹和棉花。当人民群众得知解放军急需棉衣过冬的事情后，纷纷找到部队进行捐赠。穷苦的乡亲们本来过着“一套棉衣穿三代，一条麻袋御风寒”的苦难日子，可他们却慷慨地送来仅有的一块土布、一包棉花等，有的还把拆洗过的旧粮食口袋送来。看着一个个衣不遮体、遍身破絮的乡亲，战士们深受感动，同时也决心要为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奋勇作战。

经过东拼西凑，部队总算把做棉衣的材料筹集齐了。但这些布匹有红、蓝、白等各种颜色，为了把颜色统一，战士们再次发挥创造精神，自己调色染布。大家尝试着用稻草灰、锅底灰、烟灰等各种原料调色染布，同时，还用

树枝、竹鞭以及自制的弹弓弹棉花。布染好了，棉花也准备好了，下一步就是裁剪。有的战士脱下衣服依样画葫芦，裁的裁，剪的剪，有的则向当地妇女请教缝衣技巧。对于从没做过针线活的战士们，絮棉花、锁扣眼、上口袋，处处都是难关。虽然当地妇女们都主动出来帮忙，可任凭她们再热心，也无法使战士们一下子变成“巧妇”。尤其是开领口，不是大了，就是小了。为此，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专程来到战士中间，给大家做示范，手把手地教大家。刘伯承还教会战士们“简易裁缝法”：用一只搪瓷碗扣在领口位置上，照碗大小画圈裁出领口，这样裁出的领口不大不小正合适。

经过半个多月的缝制，10万多套棉衣制成了。邓小平兴致勃勃地把自己刚缝制好的棉衣穿在身上，笑呵呵地对刘伯承说：“你看，这穿在身上不是很好吗？我们的军队就是有这么一个最大的长处，只要我们自己动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时任十八旅政委李震还写了首《棉衣歌》，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棉衣战”的场景：“此事古今从未闻，千古奇迹出我军。一切困难皆可度，全在万众是一心。”

与制式军服相比，一针一线都出自战士之手的棉衣，不太合身也不好看，可它却为战士们与数十万敌军苦战一冬、牢牢守住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有力保障。

(曹亚铂)